

公民态度



每到春运，黄牛党的“神通”几乎成为无法破解的谜题。近日有媒体报道称，票贩子用抢票软件以毫秒速度“秒杀”12306，几分钟抢完一节车厢的票，一个月至少赚几十万元。一名铁路系统的工作人员称，“大佬”级别的黄牛可以在出票之前从内部拿到票，这些人社会背景非常硬，抓到也不能怎么样。

(1月21日人民网)



漫画
陶小莫

“大黄牛”疑团需要一个真相

甬上辣评

火车票到底去哪里了？黄牛党们为何总是能轻易搞到别人束手无策的火车票？年年困扰广大乘客的问题，是时候需要解答了。如果媒体报道为真，就证明确实存在一股黄牛党潜流，他们凭借特殊资源可以大量囤票，而且违法成本极为低廉。

虽然铁路总公司照例声称，对于内部人员倒票要严惩，但声明中强调的“七不准”的售票纪律和有奖举报的措施，实际效力令人生疑。“七不准”不过是自上而下的内部规定，对于倒票背后的暴利诱惑，恐怕很难会有多少参与其中的员工当回事；而社会举报这一通常适用于其他监督领域的途径，在信息不对称、灰色交易隐秘化的因素下，民众不大可能花费大量人力时间去暗访以

发现各种线索。

但“大黄牛”疑团需要一个真相。这不仅需要铁路总公司自身的主动排查，比如组织相关人员暗访，毕竟他们更为熟悉流程，也能掌握更多的情况，司法机关也应主动行动起来。报道中称，“大黄牛”已猖獗到抓了白抓的地步，这就有可能牵涉到司法机关内部人员利益寻租的腐败现象，司法机关对此不能沉默，而要与铁路总公司协同调查，查明真相并还自身清白。

以往，由于特殊的历史因素，铁路司法机关隶属于铁道部，因此自家人的执法过程和结果，很难让人信服。随着铁路司法机关的体制改革，这一障碍已不复存在，这也意味着，地方司法机关承担起了以往铁路司法机关的监管责任。随着铁道部寿终正寝，铁老大正式向市场化企业转型，也就不能再倚仗以往的特殊身份，而要像其他市场

化主体一样接受监督，铁路总公司应当抛却“我的地盘我做主”思维，主动向司法机关寻求帮助，形成对“大黄牛”及可能的铁路员工腐败现象的严查合力。

“大黄牛”疑团需要一个真相，打开这把铁门的钥匙，就在铁路总公司和司法机关手中。春运关系到数十亿人次的车票问题，基数之大，牵涉面之广，都不再是简单的票价问题，而直指国计民生尤其是民众权益保障。车票如此紧张，黄牛们还能轻易搞到大量车票，这一事件是无论如何说不过去的。

也正因此，相关个案才引起公众的极大关注。这样的关注，表达的正是公众对于铁路部门及司法机关切实保障公平购票权利的期望。铁路总公司和司法机关对此应高度重视，主动出击，避免各种既得利益的干扰，科学严谨地调查“大黄牛”为所欲为的原因。这不但有助于消除公众的公平焦虑，也有助于铁路行业的长远发展。

毕舸

热点聚焦

落马铲字忙，莫怪世态炎凉

日前，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陈安众涉嫌严重违纪被免去领导职务。陈安众喜欢题字，尤其在他主政过的地方，往往能见到他的各种题词。但在其落马的消息公布后，江西省内许多单位都在忙着同一件事——撤下陈安众的题词。

(1月21日《东南早报》)

在任忙题字，落马铲字忙，这是何其滑稽却又符合逻辑的一幕。此情此景，让人想到江西另一名落马的贪官胡长清，时任江西省副省长的胡长清喜欢写字，以书法家自许，其权势煊赫之际，各种题字遍布南昌的大街小巷，而一朝落马，时人唯恐避之不及，纷纷铲字，曾经风光一时的胡氏书法，在南昌已遍寻不见。

这能怪人性浇薄、世态炎凉吗？其实，莫责怪那些商家，他们向陈安众、胡

长清求字，说到底盯上的是题字者的身份，把其字当成护身符而已。换言之，他们不认为字值钱，而是认为题字者的权力值钱。当题字者垮台，权力消散，其字不仅无法带来庇护的效果，反而容易惹是生非，自然欲除之而后快。

遗憾的是，题字者不明白，或不愿意明白。有两个细节，一个是，胡长清题字时常称，“我不是以一个高级干部的身份写字，而是以一个书法家的身份书写。”另一个是，胡长清落马后曾哀求，“我是书法家，求你们不要杀我，我就留在这里免费给你们写字，天天写，每天给你们写一幅。”真是至死不悟，可悲可叹。

一些官员以书法家自居，也许还有一大原因，即便于受贿。现在官场上流

行“雅贿”，不直接收现金，改收玉石字画；还有一种更神秘的“雅贿”是，通过出售自己的“墨宝”获取不菲的“报酬”，以规避受贿之嫌。但实际上，官员的一幅字能值多少钱？那些有求于官员的商人，愿意高价购字，又有多少没猫腻？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各取所需而已。据报道，胡长清收受的数百万元贿赂中，不少是有关部门和单位通过请他题字、送“润笔费”的方式行贿的。不知道陈安众卖字过程中，多大程度上存在“雅贿”？此事需要调查。

官员在繁冗的公务之余，保留一些雅好，比如书法、收藏等等，不是坏事，但是切莫把雅好变成了“雅贿”，否则因此而落马，人得进监狱字也要被铲除，何苦？

王石川

●新华时评

警惕“裸照”背后的不归路

因网曝裸照及生活作风问题帖文事件，陕西省委党校副校长秦国刚20日晚被宣布开除党籍、撤销职务。

毋须讳言，倘若抛开事件主角党校副校长的身份，这样的事件似乎早已不算新闻。从烟草局长的“香艳日记”到官员写给情妇的“结婚承诺书”，再到卫生局长、法官“开房”事件，近年来栽倒在男女作风问题上的官员可以列出一长串名单。然而，反过来看，正因这些官员“前腐后继”，说明生活作风问题至今没有引起一些官员的重视。

在一些领导干部眼里，只要工作上能力强，生活作风差点无伤大雅，所谓“不吃不占，不贪不骗；男女之事，你情我愿”，失德行为被罩上了风花雪月的浪漫外衣。有人甚至把“包二奶”“养小三”“找情人”当成领导干部能耐、魅力的象征，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种是非不分的糊涂认识，是一些领导干部在男女作风问题上“前腐后继”的一大病因。

还有权力意识膨胀问题。一些领导干部在较低层级的领导岗位时，因为职责主要是干活儿，尚能正确把握自己，而一旦被提拔重用到较高层级领导岗位，有了管人、管钱、管物的权力，对权力的认识便出现偏差，自以为有了随意支配社会资源的资本，有人投怀送抱，只需稍微动用权力给些甜头，享受的是个人，付出的是公家。多少问题官员为博“美人一笑”把原则丢到一边，为了情人的车子、房子、位子大肆违法违纪，堕入犯罪深渊。

领导干部作风无小事。因为领导干部是组织任命的，其背后是党组织的信任、人民群众的重托，一言一行都关乎党的形象、人民利益。正确认识和使用权力既要谋大局，也要重“小节”。防微杜渐，才能筑牢腐败“防火墙”。

新华社记者陈晨



据浙江省民政厅消息，从2014年起，杭州、温州、衢州三地将试点设立“婴儿安全岛”，接收遗弃婴儿。昨天，记者从宁波市恩美儿童福利院获悉，春节过后，宁波也将启动调研工作，并有计划推进此项工作。

(今日《东南商报》03版)

点评：弃婴是非人性的，自然应受道德的谴责和法律的制裁，可即便如此，也未必能杜绝弃婴的发生。逃避不能解决问题，“婴儿安全岛”的设立，就是为这些可怜的孩子建造庇佑之所，以免受到二次伤害，最大可能地保障他们的生命权。

请帮环卫工子女圆新年梦！环卫工人子女是一个特殊的外来务工群体。新年来临前，市城管市容环卫处收到了他们的198个新年心愿，目前尚未落实的有111个新年心愿，希望有更多的市民和爱心企业加入，完成这些孩子最朴实的心愿。

点评：一个新年心愿，就是一个梦想，而梦想哪怕再小，也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帮助这些孩子完成朴实的心愿，就是在为他们做力所能及的改善，虽非惊天动地的壮举，却是润物细无声的感情浸润。

1月20日，江东紫鹃新村的朱大妈来到社区居委会，不迭地说自己“太糊涂了”，又连声说“谢谢”。这是怎么回事？朱大妈说，糊涂的是自己晒被子时丢了3000多元钱；感谢的是，一帮好邻居不但捡到后送还，而且一分不少。她要好好表扬这帮好邻居。

(1月21日《宁波晚报》)

点评：从天而降的钱财就是一道道德的考题，这些好邻居不是其中的一个或几个，而是全部都交上了完美的答卷，令人赞叹和钦佩。由此可见，人性虽然复杂，我们固然必须承认它的阴暗面，却不能不相信人性的美好和可能。

社会观察

身份证重号，你错了我买单？

1月2日，在湖南株洲工作的张家界人徐连（化名）和女友在慈利县家中办了结婚酒，去株洲市民政局办理结婚证时被告知，有个和他身份证重号的人于2006年4月登记结婚了。湖南省民政厅婚姻登记处工作人员称，只要已结婚的那位当事人去户籍所在地派出所开具身份证件变更证明，再去民政局更换新的结婚证就行了。

(1月21日《长株潭报》)

按照《居民身份证法》规定，公民身份证号码是公民唯一的、终身不变的身份代码，由公安机关按照公民身份号码国家标准编制。徐连的身份证号，有两个不同的人同时使用，因此摆了喜酒也办不了结婚证。相关部门统计、编制身份证件代码出错，却要徐连为此联系相同身份证件的另一个人，这是典型的“你错了我买单”现象。

据《羊城晚报》2005年6月20日报道，当时我国至少有100万人的身份证重号。网上百度可获悉，现实中因身份证重号而遇到麻烦的人很多：比如广州王先生的驾照因没有按规定年审而被注销，重新申请考取驾照时，却因身份证件号码与一位远在哈尔滨的赵先生重号而被车管部门拒办；大庆市刘洪丽一直使用的身份证件号码，因和另一个人重了，连养老保险都办不上……

身份证重号产生的问题，不能推给市民自己去解决。如果让市民联系相同身份证件的另一个人，对及时办理相关事项或许起到加速的作用，但其间既有时间问题，也有经济损失及费用问题。如果市民联系不上对方，或者对方不愿意配合，偌大一个活人被身份证重号这个本不是自己犯的错误

得走投无路，也太冤枉了。幸亏此报道中的徐连联系到了另一个人，对方也同意按程序办理，否则徐连领不到结婚证，若夫妻双方出现感情风险，谁能承担得起责任呢？

中国这么多人，身份代码出现差错或重号不奇怪，奇怪的是，对身份证件重号没有规范的处置办法。为了方便市民，《居民身份证法》需要重新修订：一方面，应明确身份证件重号的纠错机构和责任，制订身份证件重号的快速发现和处理办法；另一方面，其他按照身份证件处理相关事务的职能部门、办事单位，不应把身份证件重号的市民一推了之，拒绝处理相关事务，而应主动联系市民所在地公安机关，在征得同意或认可的情况下，明确相关事务办理办法，尽可能给办事市民提供方便。

卞广春